

第五章 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持續與轉變的評估

冷戰後中日關係的變化，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階段：¹第一階段為登上新台階、謀求新發展階段(1990-1994)；第二階段為信賴關係減弱、摩差頻仍階段(1994-1997)；第三階段則為加強對話、緩和發展、發展面向 21 世紀階段(1997-2000)。而進入 21 世紀之後中日關係則是著延續政冷經熱的關係結構。²以這些分期來分析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背景，可以發現中日關係在冷戰結束後迄今仍未達到一個穩定的結構狀態，國際國內環境的轉變影響，加上雙方民族主義的興盛與對立發展，冷戰後中共的對日外交政策的發展既有持續亦有轉變。

第一節 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發展

冷戰後中共的外交政策，由於鄧小平時期已經確立了許多中共外交的基本原則，因此當領導人並未能有鄧小平般的領袖魅力時，仍將以承襲鄧小平的外交路線為主。而在對日外交上，冷戰後國際及國內的種種因素，特別是本世紀初的諸多事件，使得中日外交關係陷入了低潮，也因此中共領導勢必在繼承鄧小平的外交路線之外，更需加以與時俱進，才能使中共的改革開放道路能更加順暢。本節除了將探討鄧小平的對日外交思想原則，更將對後鄧時期的中共對日外交政策具有哪些繼承與創新作一番探討。

一、鄧小平的對日外交思想原則

鄧小平時期所確立的外交思想是冷戰後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至今中共仍將鄧小平時期所確立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作為外交政策的總方針，不論是第三代或是第四代領導基本上均對其外交思想作了延續與繼承。而鄧小平的對日外交思想，集中回答了中日關係的基本問題，也是其外交理論的重要部分，因

¹ 徐之先，*中日關係三十年*(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10月)，頁5。

² 劉江永，「東亞格局與中日關係」，*外交學院學報*(上海)，第80期(2005年2月)，頁66。

此在中共對日外交上具有指導性的地位。

鄧小平歷來重視中日關係，他也是「中日友好」的積極倡導者。他在 1982 年和 1984 年會見當時的日本領導人時曾說：³

「中日關係有很多話要說，但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我們黨的十二大強調這一點，說明是中國長期的國策。……我們兩國領導人在東京作出了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決策，就是把中日關係放在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來發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紀，還要發展到二十二世紀、二十三世紀，要永遠友好下去。這件事超過了我們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

從上述可見，鄧小平時期對日外交的指導方針就是中日兩國人民世代代的友好下去，中日友好也是鄧小平對日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石。鄧小平在外交政策上所確立的總體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理論基礎則是和平與發展。⁴和平與發展的理論體現在對日外交政策上，1985 年 6 月鄧小平在發表題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講話中說：⁵

「歐美國家和日本是發達國家，繼續下去，面臨的是什麼問題？你們的資金要找出路，市場要找出路，不解決這個問題，你們的發展總是要受到限制，我過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談這個問題，跟歐洲朋友、美國朋友也說這個問題，他們的腦子裏也裝了這個問題。」

從和平與發展的理論當中，便可以看到鄧小平注重對日本經濟外交的戰略。正是在鄧小平對日經濟外交思想的推動下，中日復交後，兩國積極開展了各種經濟外交活動，在政府層次上有大平內閣所啓動的對華「ODA(政府開發援助)外交」，在民間層次上則有日立、東芝、松下等大企業以及著名企業家松下幸之助積極推動的「家電外交」，這些經濟外交活動最終導致了「政治與經濟雙贏」的

³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 53。

⁴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出版社，2004 年 6 月)，頁 64。

⁵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92。

結果，對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⁶

至於中日之間固有的歷史與領土爭議，鄧小平一貫主張雙方應本著「正視歷史，以史為鑒」的原則精神來處理，做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首先，要不忘前事。鄧小平講到：⁷

「算歷史賬，日本欠中國的賬是最多的。日本軍國主義是近代中國最兇惡的敵人，是破壞中日友好的禍根，這個事實必須講清楚。要吸取歷史教訓、高度警惕並努力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復燃。要不計歷史恩怨，向前看。」

第二，鄧小平在談到日本右派的反動傾向時曾指出，不單是中國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⁸此外，他還指出：⁹

「講歷史要全面，既要講日本侵華的歷史，也要講日本人民、日本眾多友好人士為中日友好奮鬥的歷史，這些人多得很吶。」

這就強調了我們不能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算到廣大日本人民的頭上，必須把廣大日本人民和極少數日本右派分子嚴格區別開來，這是中國對日外交工作中必須把握的一項基本原則。

從鄧小平的對日外交思維可以發現，其中極具有務實的成分，這是在和平與發展的外交理論基礎上拓展開來的，強調中日經濟交流的重要性以因應改革開放所需具有的國際環境。而對於中日之間的爭議，則採存異求同的思維來看待，即使是中日之間最為突出的釣魚台領土爭議，鄧小平也主張擱置主權、共同發展來謀求雙方人民的根本利益。馮昭奎在總結鄧小平對日外交思想就認為有五大特色：¹⁰ (1)友好外交；(2)國民外交；(3)經濟外交；(4)謙虛外交；(5)和平外交。而貫徹

⁶ 閻靜、戴利朝，「略論鄧小平的對日外交思想」，*江蘇大學學報*，第5卷第4期(2003年10月)，頁19。

⁷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293。

⁸ 同上註，頁230。

⁹ 同上註，頁349。

¹⁰ 馮昭奎，「鄧小平對日外交思想與中日關係的現實」，*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二期(2000年)，頁

這五大特色最爲重要的原則就是友好外交，中日的友好外交是中日關係的基礎，也因爲中日的友好外交，中日之間歷史的問題也才能擱置於一旁。這五項特色不單是鄧小平時期對日外交的指針，第三代甚至第四代領導對日外交的基本方針也大多仍遵循著這些指導原則。

二、後鄧時期中共的對日外交策略

冷戰結束初期，前蘇聯瓦解導致的國際局勢的轉變，以及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面對西方不同程度的制裁，使得中共外交陷於孤立與被動，而日本亦參與西方對華的制裁行動。面對此種國際形勢，鄧小平在 1989 年 9 月便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的因應方針，之後又提出「善於守拙、韜光養晦、有所作爲」等指導原則，此即中共所謂的二十八字方針。¹¹其中以「韜光養晦」爲主軸，是在體認國際現實後採取的權宜措施，使得中共得以在變動的國際環境下找到立足點。從 1991 年 8 月，日本海部俊樹首相訪華標誌著中日關係的全面恢復。而 1992 年雙方爲紀念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爲了進一步增進兩國友誼突破外交孤立，江澤民總書記應邀訪日，日本明仁天皇訪華，江澤民總書記對日本天皇說：¹²「發展中日友好，一要以史爲鑒，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代友好下去。」可見冷戰結束後中國依循著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戰略思想，順利的突破當時外交上的孤立狀態，而在對日外交上江澤民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除了繼承鄧小平的對日外交基本原則之外，更對新時期的中日關係的特點與時俱進的提出一些新的調整。

冷戰後中共外交的首要任務便是突破外交孤立，其次則是要對冷戰後的世界格局作深入的分析，以尋求適當的地位。就中共而言，雖然中共認知國際權力結構之「兩極格局已經終結，...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¹³而且自認爲是此一

19。

¹¹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321、363。

¹² 黃生秀，「論中國對日本的外交政策」，**青海師專學報**(青海)，第 3 期(2005)，頁 27。

¹³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353。

權力結構中的一極，但是中共深知目前其並沒有與美國對抗的實力，而且對美國關係惡化，將可能使美日盟更加緊密、導致中共再度外交孤立。因此，冷戰後中共除了標舉和平與發展作為前提，拋棄意識型態對峙，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對外更加開放之外，在外交做法上則主張實行全方位外交，以便營造有利於國內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外部環境。¹⁴全方位外交雖然主張與世界各國均保持友好關係，但實際上，它包含兩大重點：一是加強與發達國家的關係；其次是發展睦鄰友好關係。¹⁵早在 1990 年，鄧小平即已指出：將與蘇聯、美國、日本、歐洲打交道搞好關係；¹⁶1997 年十五大會議期間，江澤民也首度在公開確認發展與發達國家關係的原則。

冷戰後中共雖然積極的塑造穩定的國際與國內環境，並且著重於發達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發展，但是隨著中國積極軍事現代化的後果，造成的是各國對它的未來意圖感到恐懼，美國即使認為現在中國仍不是主要的威脅，但仍處處提防著中共軍事的現代化發展，對日本及亞洲鄰國來說更是感到不安。而 1995 年 2 月美國主管國際安全的國防助理部長奈伊(Joseph Nye)，提出一份美國亞太安全報告，即所謂的奈伊方案(Nye Initiative)明顯的修正了老布希時代的美國亞太政策，不再將來自日本經濟上的挑戰，視為美國的主要威脅，而將注意力轉移到中國大陸的軍備擴張之上。中國威脅論的論述伴隨著中國在軍事、經濟上的崛起而不斷上升。在此背景之下，1996 年以來，日美先後發表與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日美防衛新指針」以及「週邊事態法」等一系列法案，重新確定並擴大了美日軍事同盟的內容、範圍以及防衛對象，標誌著美國亞太戰略完成了由防日到防華的演變，以中國為對象的日美同盟新機制正式確立。¹⁷

¹⁴ 吳心伯，「冷戰後的國家安全與中國外交」，劉三、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年)，頁 230-231。

¹⁵ 于有慧，「中共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47。

¹⁶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359。

¹⁷ 劉學政、李志東、梅仁毅，「冷戰後中美關係中日益上升的日本因素」，杜瑞清、王旭主編，**中美關係與國際格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12 月)，頁 473。

對於上述國際情勢的轉變，中共採取的態度，仍是積極提倡多極化的國際格局，這主要的目的是要在國際上形成主要大國間的力量平衡，將有利於制止霸權主義，以及提升中國之國際地位，而具體的實踐則反映在積極的建構大國之間的夥伴關係，以及大國外交的戰略構想上。繼中俄、中美相繼發表戰略夥伴關係之後，中日也於 1998 年達成協議。199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約 20 周年，就中日關係處於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歷史時刻，1998 年 11 月江澤民訪日時，中日一致同意建設「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並以此為基調發表了《中日聯合宣言》，達成了 33 項合作協議，在新的雙邊框架下，中日關係進入了以建立「夥伴關係」為目標的穩定發展時期。¹⁸

從中共大國外交的戰略角度來看，處理好中日關係不但有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現代化，也將有助於中國建構一個穩定與安全的周邊環境，進而在大國關係中爭取更為有利、更主動的戰略地位，因此儘管中日關係的和平發展在 90 年代以來面臨了許多的挑戰和不確定，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仍然突出合作面，降低衝突面，在消極上為了避免中日衝突，在積極上則是要聯日制美，防止美國稱霸亞太。

19

後鄧時期的對日外交策略，在第三代領導為確保政權穩定之下，大體上是繼承鄧小平的對日基本方針，在與時俱進的部份中共發展了大國外交的戰略思維來因應新的國際環境轉變，對日外交部份中共則致力於中日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以爭取穩定的戰略機遇期。但中共內部日漸上揚的民族主義情緒，也使得失去鄧小平領導的中共，高層為了鞏固權力的合法性，可能會使得民族主義變得更具侵略性，並進而影響外交政策。²⁰尤其是中共與日本之間，具有的歷史及領土爭議都是中國民族主義情感的重要來源，因而也使得中共在對日外交策略

¹⁸ 金熙德，「中日關係進入友好合作新階段」，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114/271520.html>>

¹⁹ 林佳龍，「中國的國家戰略與對外政策」，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頁 227。

²⁰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2 (Jun 1995), p.295.

上，缺乏信任的基礎。這反映在中共與日本的夥伴關係上，與其他大國關係比較，在致力於發展方面，由於中日具有利地理鄰近與文化同質的優勢因而較突出，但在致力於和平方面則相對薄弱，因為中共與日本缺乏進行戰略合作的基礎，無法像中共與美國或俄羅斯一般，對於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的問題採取直接參與的方式。²¹

三、中國和平崛起外交戰略下的對日外交

中共和平崛起的戰略發展，從 2003 年 11 月 3 日，原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演講，首次提出了中國和平崛起這一論題。²²2003 中共總理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作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中，則第一次向外界清晰明確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為未來的中國角色定位，也代表中國政府首次闡述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思想。他說：²³

「我們要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充分和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制創新，依靠開發越來越大的國內市場，依靠把龐大的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要義就在於此。」

這一講話標誌著中國和平崛起正式成爲一項帶有根本意義的國家戰略。2004 年 2 月 23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中，胡錦濤總書記則再次強調，要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²⁴

關於和平崛起的外交思維，在中國國內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中國方面的學者認爲和平崛起是中國外交的新思維，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而和平崛起的思想也爲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賦予了新的內涵。中國的

²¹ 邱坤玄，「中共外交政策」，張五岳主編，**中國大陸研究**(台北:新文京出版社，2003)，頁 156。

²² **文匯報**(北京)，2004 年 3 月 21 日。

²³ 張毓詩，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外交方略，**江南社會學院學報**，第 6 卷第 4 期，頁 20。

²⁴ 「堅持以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分析形勢提高對外開放條件下做好工作的能力」，**人民日報**，2004 年 2 月 2 日。

和平發展、和平崛起之路就是中國現代化之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和平崛起思想」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思想」、「重要戰略機遇期思想」一脈相承，在思想上同出一源。²⁵

張毓詩認為基於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報告對於國際形勢和發展趨勢的總體判斷，服務於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戰略目標，形成一條與經濟全球化相結合的、獨立自主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強國之路。而這一新思維在外交上的主要內涵有：²⁶(1) 維護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於增進人類的共同利益；(2) 「和而不同」理念是中國古代文化的財富；(3) 在國際安全領域大力倡導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核心觀念之一；(4) 「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為中國和平崛起爭取穩定的周邊環境。

夏立平認為為中國和平崛起服務的國際戰略新理念，包括了：²⁷(1) 「和而不同」世界觀是中國國際戰略新理念的核心；(2) 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觀是中國國際戰略新理念的前提；(3) 和平、合作、發展、進步、公正的文化價值是中國國際戰略新理念的精髓；(4) 國家利益與全人類共同利益相結合的利益觀是中國國際戰略新理念的基礎；(5) 新安全觀是中國國際戰略新理念的保證；(6) 國際新秩序觀是中國國際戰略新理念的長遠目標。

馮昭奎則認為中國和平崛起體現在外交的新思維上有以下的特色：²⁸(1) 在外交姿態上，表現出理性、靈活、務實、細緻、謙虛和建設性的姿態。(2) 在外交風格上，表現出溫和而堅定的外交風格，努力樹立既決不當頭又有所作為的國家形象。(3) 在外交方針上，強調外交要為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服務，特別重視經濟外交，並且充分考慮到國內穩定與對外關係穩定這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

²⁵ 樊體甯，「論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第3期(2005)，頁19。

²⁶ 同上註，頁21。

²⁷ 夏立平，「論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國際戰略新理念」，王緝思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大國戰略卷**，(台北: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260-264。

²⁸ 馮昭奎，「中國與亞洲:和平崛起與外交新思維」，**世界知識**，第5期(2004年5月)，頁43。

至於西方對於中共和平崛起外交戰略的認知，如美國前總統喬治·布希 (George Bush) 曾指出：²⁹「我已注意到胡錦濤主席和(中國的)現任領導集體正在致力於我們稱之為和平崛起的事業。這使亞洲其他國家非常放心，它對亞洲的整個面貌都非常重要。」2005年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也曾在演說稱：³⁰「我們對擁有自信，以和平方式實現繁榮的中國崛起表示歡迎。」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學者約瑟夫·奈 (Joseph Nye) 則說：³¹「如果中國保持和平崛起的態勢，這會給其本國、鄰國以及美國人民帶來很大好處。」可見西方是樂於見到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穩定的。

胡溫體制自2003年執政以來，在外交方面展現與過去極為不同的風格，較過去積極活躍，不論是在睦鄰外交、多邊外交方面，中共皆扮演區域強權的角色，和平崛起的外交思維也與過去韜光養晦為主軸的外交模式有明顯的分別。中國和平崛起所體現在外交層面新思維的核心便是「新安全觀」和「共同利益觀」，這對當前形勢下中國的發展崛起具有突出的意義。2005年11月18日，胡錦濤在APEC第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深化亞太合作，共創和諧未來》中就強調：

³²

「要攜手努力，有效應對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應該按照公認的國際規則，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通過對話協商，共同尋求解決分歧之道；要凝聚共識，共同推進多邊貿易體制健康發展，應該鼓勵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自由貿易協定，推動雙邊和區域經濟合作、多邊貿易體制協調發展；加強協調，採取應對熱點問題的共同行動，應該制定和完善合作機制，鼓勵和支持科技研發，分享資訊和經驗，開展有針對性的能力建設專案。」

而在對日外交的方針上，胡錦濤在2004年4月23日參加印尼亞非峰會期間與

²⁹ 楊中旭、馮亦斐，「和平崛起引領中國未來」，**新聞週刊**，第16期(2004)。

³⁰ 「亞太安全論壇2005年國際會議講詞」，**美國在台協會**(2005年10月)。
<<http://www.ait.org.tw/zh/news/officialtext/viewer.aspx?id=2005101301>>

³¹ Joseph Nye，「中國人意識到和平的可貴」，**海峽時報**，2005年2月3日，2181。

³² 「深化亞太合作，共創和諧未來」，**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2005-11-19>>.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會晤提出了五點主張，內容包括：³³「嚴格遵守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友好和平條約、中日聯合宣言，以實際行動致力於面向21世紀中日友好合作關係；堅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正確處理好台灣問題；平等協商妥善處理中日之間的分歧；進一步加強雙方在廣泛領域的友好合作。」2004年5月胡錦濤又指出中日應該共同構築友好、合作、互利、雙贏的新型的中日關係。

在對日外交具體作為方面，十六大以後胡溫體制在建構和平崛起發展戰略思維的同時，最為重視的外交工作便是推動大國外交和睦鄰外交，也就是說新的領導體制仍然繼承了後鄧時期的外交作為，積極推動與世界大國及周邊國家的穩定關係。不過，在對日外交上卻由於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因而自2002年開始中斷首腦互訪至今。胡溫體制雖然仍強調對日友好外交為基調，強調「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為處理中日關係的準則，但是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發展，已經有超乎官方所能掌控的地步，也因而在對日外交戰略上稍有不慎將引發激烈的反彈。目前以中日關係政治淡冷的情勢看來，胡溫體制在對日外交上強調「以史為鑒」仍然是相當的突出，至於如何建構「面向未來」的理論基礎以及戰略思維，並合乎和平發展的戰略思維，將是考驗當前中共領導的時刻。

第二節 中日「面向未來」外交關係與民族主義的關連性

從上節所探討的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發展來看，冷戰後中共的對日外交政策有持續，亦有轉變。伴隨著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逐漸興盛，以及民族自信的加強，中共領導在外交風格上也有別於過去的反應式外交，而改採更加積極主動的有所作為。

在對日外交上，雙方民族主義呈現的對立狀態既然是雙方政冷的因素之一，

³³ 「胡錦濤會見小泉 強調中日兩國和則兩利鬥則兩害」，[新浪中國新聞網](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3/23545732190s.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3/23545732190s.shtml>>

因此中共在建構中日面向未來的外交戰略時，也就不得不謹慎處理這個問題，在此本節將探討中共在建構新的外交戰略下，對於民族主義的處理具有哪些意涵。

一、中國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外交戰略下的民族主義意涵

中共自從改革開放以後，一方面經濟成長，一方面內部的問題與弊端與如影隨行的隱藏其後，因此國際間乃有了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的說法，爲了實現走出去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需要，以及作爲一個穩定區域安全負責任的大國，胡溫體制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戰略思維，旨在建立堅持平等發展、不稱霸的外交政策，藉由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來消除長期以來國際間對中共的疑慮。即便在 2004 年 4 月起，中共官方已顯露不再聲稱和平崛起的跡象，改採和平發展的說法，然而中共崛起的過程卻是不爭的事實，不願明確的說出也並不代表不存在。趙穗生就認爲儘管民族主義可能在國家安全、主權議題採取強硬的立場，但是目前務實的領導者仍然盡量避免影響與他國之間的關係，領導者不斷的透過強調和平崛起、和平共存以及和平發展的外交戰略，以避免衝擊中國現代化及利益。³⁴

從中國和平崛起與發展的戰略論述內容來看，相當程度的反應了中共對自身的定位以及對國力上升的民族自信心表現，崛起與發展的差異在於：發展是一國實力絕對量的擴大，崛起則是相對量的概念，意味實力與他國差距縮小。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共即提出和平發展，意指中共仍未發展，需將全力放在發展，然而卻不必然認爲中國未來一定會崛起；相對的，和平崛起則代表中共對於本身崛起充滿自信，中共一定會在不久的未來崛起。³⁵和平崛起的提出也代表中共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領導人終於公開承認崛起的事實或可能性，³⁶因此若非基於對本國實力的自信，若按過去自鄧小平以來一脈相承的外交傳統，承認崛起與韜光養晦精神是極度相違的。

³⁴ 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31, No.3, (1998), p.287..

³⁵ 于有慧，「和平發展：胡溫體制外交戰略初探」，*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1999 年 3 月) 頁 53。

³⁶ 「在和平中崛起」，*大地*，2003 年 3 月 11 日。

中國和平崛起與發展的論述除了適時的提供民族主義情緒一個抒發的管道之外，也提供了官方愛國主義建構的一個方向，以用來凝聚人民的向心力，培養國民健康的大國心態。關成華在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 85 周年大會上的演講中就指出：³⁷

「一個理性、平和的愛國主義情感和態度的產生，不僅取決於不斷增強的國家經濟實力，還依賴健康的國民心態，因為國民的心態和這個民族國家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狀況緊密相關，反映這個民族的認識水準和發展程度，折射出國家的綜合國力和發展潛力，體現並塑造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個民族的內聚力和對其他民族的感染力，因而也決定這個民族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沒有感染力的民族稱不上偉大的民族，更難以在世界民族之林樹立威望；一個心態與發展不相適應的民族，很難有多大作為，甚至可能失去機遇、遭受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心態是影響民族國家前途命運的一項至關重要的軟實力，所以培育一個充滿自信、不卑不亢大國國民和客觀、溫和、理性、寬容的大國心態是新世紀愛國主義的時代要求，也是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任務。」

近來中共領導階層也相信中國和平崛起與發展所需要的是理性的民族主義 (rational nationalism)，而不是大眾的民族主義 (populism) 的情緒性反應，理性的民族主義不但可以展現出中國的民族自信，另一方面也可以向世界宣傳中國的傳統與民族特色，而大眾的民族主義則可能會危及共黨的一元政治論述以及政體的穩定，因此目前中共領導所需求的民族主義象徵的是一種軟權力，用以作為中國和平發展的工具。³⁸而此種理性之民族主義所具有的文化內涵，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以及深厚的感召力，透過遍及全球的華人網絡，將可形成中共外交的軟權力，增加中共外交的文化影響力。³⁹

至於中共官方對於民族主義的態度，一方面中國要崛起，必然是需要民族主義

³⁷ 關成華，「和平崛起需要青年具有健康的國民心態」，北京共青團網(2004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bjyouth.gov.cn/special/lzag/gzdt/22827.shtml>>

³⁸ Xiaoxiong Yi,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Understanding China's Peaceful",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2005), p108.

³⁹ 馮江，「軟權力與中國和平崛起」，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2 期(2006)，頁 118。

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中國要和平，則必須要防止過於極端的民族主義。這種既需要又必須謹慎面對的態度，也反映在中共對於國內傳媒的整頓態度，其中以從1994年創刊的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停刊事件最為受到關注，冰點週刊停刊的原因主要在於其刊載的文章，除了與主流媒體大力宣傳的民族主義化與潮流背道而馳之外，更挑戰了官方民族主義的論述。在2006年1月由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在《冰點》週刊上發表了他的長篇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之後，冰點就遭到停刊的命運。在這篇文章的一開頭便展現出了冰點週刊的批判性，作者就開宗明義地提出：⁴⁰

「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災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冰點》週刊的停刊，引發了海內外輿論的關注與壓力，這也使得標榜建設和諧社會的胡溫體制有所顧忌，中共高層因而在一個月後同意其復刊，但是主編李大同卻遭到免職，其復刊之後刊物原有的批判性也大不如前。⁴¹由此可以發現的是中共官方在對民族主義的詮釋上，是透過排除不利於其和平崛起的民族主義心態，並將之視為不健康與不理性，這一方面可以鞏固其和諧社會的理念，另一方面亦可避免過激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其和平發展的環境。

2006年胡錦濤在聯合國六時週年元首會議上更提出「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並發表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演講，中共自詡，這一理念向世界傳達的資訊是改變衝突思路、共同建設和平與和諧的國際社會。這一外交戰略除了是對和平發展戰略的繼承之外，也顯示出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強，國家外交中對外的一面將增加，由主要為自身利益服務的和平環境戰略，轉向為亞洲與世界謀求共同發展與安全的戰略，從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將民族主義與

⁴⁰ 徐時利，「狼奶」史話，**台灣大紀元**。<<http://tw.epochtimes.com/bt/6/8/21/n1428724p.htm>>

⁴¹ 張裕亮，「冰點副刊靈魂不再」，**展望與探索**，第4期(2006)，頁16。

國際主義相結合，民族主義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是一項必要的條件，但是對於其所產生的負面因素，中共也不斷的在作調整與因應。

二、中共對日外交新思維的民族主義意涵

冷戰後中日關係逐漸走向政冷經熱或政經雙冷的結構，在安全問題上又有大國安全競爭的困境，此外，中日能源方面存在的競爭，亦可能將影響中共和東協國家的關係，因而對於中共和平崛起的期望產生不利的影響。近來中共致力於周邊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合作關係的周邊外交，以期在在東亞整合當中發揮主導性的地位，但是中國國內的反日情緒依舊高漲，日中關係的緊張態勢也未見和緩，此非但不利於中共周邊外交的佈局，亦將可能對中共和平發展所依賴的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由於中日關係困局所產生的影響，其實中共和日本內部都已有不少人士，體認到中日關係的困境將對雙方長遠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主張雙方應改變觀念，以加強合作交流來解決新舊紛爭。2002 年底至 2003 年初，《戰略與管理》雜誌先後發表了中國學者撰寫的關於發展對日關係的兩篇文章：一篇是原《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撰寫的《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⁴²另一篇則是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教授寫的《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⁴³這兩篇文章提出要淡化歷史因素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以「新思維」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是為對日新思維提出的開始，此後引發學術界及民間的廣泛討論。對日新思維的提出，主要站在大國戰略的發展角度，認為中日之間應該朝向和解發展，然而此種提法卻並未詳細考察社會心理與民族性的問題，從以下中國學者們對於對日外交新思維的探討文章中可以充分顯現。

首先，對日新思維強調淡化歷史問題，不使其繼續成為改善中日兩國之間關係的障礙。新思維者主張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已經解決，即使有也可以擱置起

⁴² 馬立誠，「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戰略與管理**，第 6 期(2002)。

⁴³ 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第 2 期(2003)。

來，此舉一方面可以抑制國內的狂熱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則可以與日本合作來制衡美國。⁴⁴

第二，強調中日接近制衡美國的觀點。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考慮，現在中日兩國貿易和人員往來規模之大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但是兩國國民的情緒卻趨於僵化，這就容易造成誤會連著誤會。這種局面不僅會給兩國決策層造成巨大壓力，也容易被美國人利用，如果再放任日中兩國國民間日益深化的敵對情緒，就有可能導致日本的排外主義與反華情緒高漲並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的狀態。因此中國應該全力對付的是宣揚霸權主義與中國威脅論的美國，而日中合作將是牽制美國的中長期戰略，中國應該寬容日本、理解日本，使日中關係得到改善，進而提高在對美外交問題上的戰略地位。⁴⁵

第三，強調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國際條件。然而，中國的外交新思維並不僅僅是爲了中國自身崛起而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同時還要「睦鄰、安鄰、富鄰」，與鄰近國家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以實現整個亞洲的和平崛起。中國的和平崛起與亞洲的和平崛起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謂對日關係新思維，將借力於和平崛起外交戰略的研究而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長遠看，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是亞洲地區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反過來說，加快亞洲合作、復興和崛起的進程，也是推動中日關係的重要動力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⁴⁶

第四，對於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省思。台灣學者林武雄認爲對日新思維提出的背景是對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省思，他認爲中日之間在安全問題、教科書事件、歷史問題以及靖國神社參拜議題上，中國政府與民間都做出過分敏感的反應，因而使得胡錦濤時代對日本外交必須做一個最大調整，就是在提出長遠性

⁴⁴ 孟國祥，「中日外交新思維與歷史問題」，*南京醫科大學學報*(南京)，第3期(2004年9月)，頁193。

⁴⁵ 劉曉峰，*日本的危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23-25。

⁴⁶ 馮昭奎，「中國與亞洲和平崛起與外交新思維」，*世界知識*(北京)，第5期(2004)，頁43。

的對日外交「新思維」。⁴⁷

從中共對日外交新思維的觀點來看，除了是對當前中日困境的尋求化解之道，而繼承鄧小平以來的中日友好外交思想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對中日之間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反思，鑒於民族主義在中共對日外交的政治、經濟社會及軍事安全所產生的影響及困境，對日外交新思維的提出期望能在這些議題上作出回應，這也象徵著中共在為中日面向未來作出理論建構。但是值得觀察的是民族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帶有情緒性的心理，透過對民族主義的劃分，是否就能成功的抑制過於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尤其是中共目前改革開放所累積的種種壓力，早在上個世紀末就有學者提出中國崩潰論的說法。⁴⁸而在對日外交關係上，當前似乎已變成了中國激烈民族主義者抒發的一種管道，因此中共官方以及學者們在尋求中日面向未來的同時，透過強調理性、健康的民族主義心態是一種必要手段，但是仍然難保引發不小的反彈聲浪。

不可否認，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興盛為中日關係之間突出了衝突的層面，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民族主義也扮演了一種反省的力量，透過認識民族主義，或許將可以為中共的崛起注入了更深一層的文化基礎，使得外界能正確的理解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的民族主義，而將民族主義導向理性與健康的一面，也或許可以為中日面向未來的外交關係奠定基礎。

第三節 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持續與轉變的平衡

從近來對日外交的反思中可以發現，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紛歧達到了一個高潮，民間民族主義與官方民族主義的紛歧，亦或是近來受到重視的理性民族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的分別，無論中共選擇如何打民族主義這張牌，這張牌都將不容

⁴⁷ 林武雄，「胡錦濤對日本展開協調外交」，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takeo-05.asp>>

⁴⁸ 章嘉敦著，侯思嘉，閻紀宇譯，中國即將崩潰(台北:雅言文化，2002)。

易是中共所能單獨掌控的。⁴⁹民族主義的多種面向在此展現，但官方的民族主義立場一向站在一個務實的角度，一方面利用民族主義獲得人民的信任，另一方面則藉此凝聚人民的力量發展現代化。⁵⁰也因此，從近來中共的對日外交作為來看，中共不只將尋求對日外交利益的平衡，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發展過熱的傾向，中共似乎也是在其中謀求一個平衡。

一、從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探討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侷限

冷戰後中日關係呈現的不穩定狀態，當前中日雙方也均認知到其所產生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民族主義若是顯得太過於強勢，不只將引起國際上中國威脅論更加具有正當性，國內的輿論也將可能更難以掌控。因此，中國不論是官方與學界在論及中共的對日外交政策上，目前都出現了許多反思的聲音，欲從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的擺盪中尋求一個平衡，以維持適合於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戰略環境。以下將從中共對日新思維、中共政權合法性、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中日民族主義博弈這幾種角度，來探討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侷限。

首先，從中共對日新思維來探討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對日外交新思維在一些有影響的新聞和學術界人士提出之後，引發了中國沉澱已久的民族主義反彈，各種批評頻繁的出現於中國大陸的論壇上。反對者大多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堅持維護政治與國家安全上的利益。第一，在歷史問題上認為日本政客及右翼份子也要負很大的責任，而並非是中國單方面採取新思維就可以改變現狀，與此相對的是日本更需要新的思維。⁵¹第二，批評對日新思維中認為一切問題都可以用經濟手段去解決的看法，中日的經濟利益固然重要，但是政府應將國家與政治利益置於經濟利益之上才對，而不是為了經濟利益而在政治與國家利益上讓步。⁵²

⁴⁹ Xiaoxiong Yi.(2005), p.107.

⁵⁰ Suisheng Zhao.(2006), p.9.

⁵¹ 王冰泉，「簡析民族主義與對日新思維」，**忘年交書簡**(上海)，2005-6，頁 52。

⁵² 許可，「中日關係需要什麼樣的新思維」，**重慶郵電學院學報**，第 3 期(2005)，頁 330。

第三，在對日新思維中幾乎看不到維護國家利益四個字，反而是充滿了道德說教意味。例如非暴力準則、反對輿論暴政、避免泯滅人類公義、信任鄰國、尊重個人行為、極端民族主義有害、應該寬恕和容忍等等的字眼。⁵³

除了一些學者站在袒護國家利益的立場上評論對日新思維之外，網路上更是引發廣泛的討論，網民更以漢奸等激烈的文字語言，來稱呼對日新思維的倡導者。儘管引發如此大的反彈，但新思維還是由諸多位論者在同一個方向上不斷撰文，文章也還是一篇一篇刊載在具有影響力的媒體上。⁵⁴對日外交新思維的論戰，在中國逐漸的擴展，從各種批評之間的論戰來看，似乎反映了冷戰後中日關係的確存在著民族主義的作用，物質層面的中日利益與精神層面的民族主義的對抗之下，中國民族主義的紛歧也達到了一個高潮，不論是民間民族主義與官方民族主義的紛歧，亦或是近來受到重視的理性民族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的分別，都可以發現無論中共選擇如何打民族主義這張牌，這張牌都將不容易是中共所能單獨掌控的。⁵⁵

第二，從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角度來看。1990年代以來幾次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潮，似乎演變到最後都在中共掌控的範圍之內，有學者也認為對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抱持著憂慮態度其實是不成熟，甚至過於誇張的看法。Erica Strecker Downs and Phillip C. Saunders 在研究中，觀察了 1990 及 1996 年的釣魚台領土爭議發現兩次事件當中，發現雖然兩國的民族主義團體想要使爭議更為激化，但中共政府卻願意採取相當自制的策略而與日本政府合作，犧牲自己的民族主義立場以避免領土爭議傷害雙方經濟關係，可見民族主義雖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但經濟發展的穩定或其他因素亦是相當重要。⁵⁶從 2004 年以來一系列的反日示威遊行當中也是如此，觀察事件的演變，甚至不少人認為這根本就是中共官方所

⁵³ 徐之先，**中日關係 30 年**，頁 365。

⁵⁴ 包淳亮，「關注中日接近的外交革命論述」，**中國事務新聞台**。
<<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dajungli/Article-70.htm>>

⁵⁵ Xiaoxiong Yi.(2005), p.107.

⁵⁶ Erica Strecker Downs and Phillip C. Saunders，「合法性與民族主義的限制:中共與釣魚台列嶼」，Michael Brown 編，國防部史政編譯館譯，**中共崛起**，頁 76。

操控的事件，中共官方似乎已經預設了停損點，衝突事件才並未擴大到無限上綱的地步。⁵⁷

第三，若將民族主義的限制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來看。根據 Peter Evans 提出的鑲嵌的社會自主性(embeddedness social autonomy)理論，似乎也能為中國民族主義自主性限制提供一個解釋。鑲嵌的社會自主性其定義即為社會之自主性是在某些一定的範圍內被允許，若是超出這個範圍就會受到國家的限制，這個概念主要源自 Peter Evans 觀察南韓地下鐵罷工事件最終導致工人被政府的強制警力逮捕而恢復地下鐵的正常為例，說明儘管國家為經濟發展扶持某些社會力量，但當國家想要使用強制手段時，他依然擁有自主力可以實施。⁵⁸而若將此種觀點應用於中共可以發現的是，從中共的政權屬性來說，社會之自主性應該是鑲嵌於以國家為代表的某種權力結構當中。這從本世紀初中國的反日民族主義的風潮來看，中共政權為鞏固改革開放而從 90 年代起就不斷的強化愛國主義教育的灌輸，但是當民族主義的風潮展現出社會自主性，而趨於激烈的反日示威之時，中共仍將會展現強制的手段施以壓力。因此，民族主義要能展現出自主性，從中共目前國家的政權結構來看，仍有其一定的限度。

第四，從前述關於中日民族主義的博弈分析當中，亦可以發現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限制。近來對日新思維的主張雖然是一種對日政策改採溫和的態度，也是突破中日僵局的一種手段，但可能必須付出的代價就是失去國內人民的支持。從中共方面的認知以及反日示威遊行似乎在官方的掌控範圍之內來看，對於中共來說，似乎目前雙邊政治經濟關係的改善所獲得的收益將逐漸大於贏得國內人民支持的收益，因為中日關係政治困境的現實環境，不單單是政治層面的議題，近來更逐漸的有擴散至經濟層面的趨向，形成中日「政冷經冷」的結構，這將可能對

⁵⁷ 如林保華，「冷眼旁觀中共反日鬧劇」，大紀元(2005年5月4日)。

<<http://tw.epochtimes.com/bt/5/5/4/n910756.htm>>：「北京反日大遊行 中共企圖轉移危機」，大紀元，<<http://tw.epochtimes.com/bt/5/4/10/n883747p.htm>>；「中國反日活動，政治操作民族主義」，民主通訊(2005年4月16日)，

<<http://www.asiademo.org/b5/news/2005/04/20050416.htm>>等等。

⁵⁸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27-228.

中共所宣示的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的外交戰略目標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中共勢必將從對日外交新思維與民族主義聲浪中，尋求一個平衡。從以上的探討可以發現，對於中國民族主義採侵略性的看法，目前也似乎仍然言之過早，因為在中共的認知裡，現在仍是追求富強的過程，還未達到富強的實力，只是對於中共未來的意圖為何，這將是未來值得關切的問題。

二、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中共同利益與衝突利益的平衡

若從民族主義的認知來看，在中國人百年來的受害者心態及強國情節影響下，中日之間似乎很難具有共同的利益，反倒是利益的衝突面不斷的在安全、政治、經濟利益上擴張，但是這卻與中共所需要的和平崛起與和諧的世界觀不相吻合，尤其是經濟利益上的落差，將可能牽動的是中共政權的另一個合法性來源，即穩定的經濟發展。因而中共領導目前也特別強調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層面，胡溫體制在對日方針上不斷強調，應維持中日未來的合作關係，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⁵⁹對於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發展，有不少學者認為法國和德國的模式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德法從一九五一年雙方建立煤鋼聯營發展到歐盟的長期和平，因而中日之間也應透過建設東亞共同體、發展共同利益，來解決中日問題。⁶⁰

不論是「德法模式」或是「東亞共同體」的建構，若要突出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首先必須要擺脫的就是中日之間的競爭型博弈，而改採合作型博弈。合作型博弈要取得最大的成功，以「獵鹿模式」為例，所有參與者必須互信，且不會採取與大家不一致的舉動，不能出現去抓兔子的人，如果有人背離去抓兔子，按照相對收益的理論，彼此沒有利益獲得就會自動回復到囚徒困境。⁶¹在經濟議題上，中日合作的經濟利益似乎是一條肥美的兔子，但也惟有彼此拿出信任，強調

⁵⁹ 曹瑞泰，「反日浪潮中，中日的對應模式」，**新聞最前線**。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scholar-59.asp>>

⁶⁰ 「吳建民指改善中日關係雙邊難題，多邊解決」，**大紀元**(2005年7月2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5/7/2/n973011p.htm>>

⁶¹ 任李明 范國平，「中日關係:相互依賴與博弈」，**東北亞論壇**(北京)，第15卷第1期(2006年1月)，頁20。

共同利益，才有可能達成。在安全層面，則應透過博弈的重複性，使中日兩國都可以從衝突當中獲得教訓，進而改採合作的策略，避免陷入集體困境。⁶²合作是中日關係困境的化解之道，但要採取合作的重大困境，就是必須改變雙方的認知差距，而這不只是強調中日共同利益層面就可以解決，要改善中日民族主義對立所形成的認知差距，需要的是強化雙方民間的互動以及交流。

觀察近來中共對日外交的作為，似乎中共也逐漸的感受民間反日情緒濃厚的不利影響，因而中共外交的智庫們也不斷的提出各種新的外交形式，來為中日之間朝向共同利益發展。這其中像是加強與日本之間的民間外交，⁶³2006年3月31日，日本桌球協會常務理事木村興治率團訪問中國大陸，紀念日中乒乓外交50周年，並破例地受到職司對日外交的國務委員唐家璇的接見，在中日關係陷入1972年兩國建交以來最低潮之際，重啟乒乓外交具有再度藉民間外交讓兩國關係回暖之意。⁶⁴除了加強民間外交之外，也有學者認為目前中日交流既有的兩大外交方式（即政府間外交和民間外交），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疲勞狀態，因而呼籲採取「第三種外交」，「第三種外交」是以各界領袖的集體力量，透過各種界人士的論壇，來推動國家間各層面重大問題的解決。⁶⁵

王逸舟認為21世紀中共的外交有三種需求，首先是發展需求，這將是中國

⁶² 韓彩珍，「東北亞合作機制的微觀解釋——從博弈論的角度」，**東北亞論壇**(北京)，第13卷第1期(2004年1月)，頁18。

⁶³ 如吳寄南，「對突破中日僵局的幾點思考」，**日本學刊**，第2期(2005)，頁23；王少普，「堅持從戰略全局觀察與處理中日關係」，**社會科學**，第3期(2006)，頁71；楊成，「中日關係：結構轉型期的瓶頸與出路」，**黨政幹部學刊**(北京)，第12期(2004)，頁45；朱適，「中日關係之現狀原因分析及相關對策」，**歷史文苑**(北京)，2005年10月，頁24。

⁶⁴ 何思慎，「日中關係：風波或坦途」，**展望與探索**，第7期(2006年7月)，頁11。

⁶⁵ 一是領袖論壇，即兩國各界領袖匯聚，集中討論影響雙方或多方關係的重大問題，發表意見，比如主辦方之一日本“言論NPO”中有400多名各界領袖，足以代表日本各界的聲音與意願。他們所討論的正是那些國家或一般民間外交層面所無法解決的問題。此次論壇提出了很多問題，比如資源與能源利用問題，兩國的民族主義問題等。二是輿論影響組織，第三外交中的成員包括眾多媒體精英，他們擁有巨大的言論影響能力，可以將論壇領袖達成的一致共識迅速在社會廣泛普及。三是實行公約。論壇往往會就某個問題達成階段性的一致。鑒於論壇的代表性以及各界領袖的影響力與號召力，他們很容易將論壇中達成的共識在各自行業貫徹。因此，第三外交在促進國家之間關係上，有區別於政府行為的約束力或執行力。劉迪，「第三種外交破解中日難題」，**環球時報**，2006年8月9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8/09/content_4937574.htm>

興盛的基石；其次是主權需求，這是不可或缺的傳統安全；第三是責任需求，及中國必須體現大國的風範。⁶⁶而在這三種需求的基本利益當中，中共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扮演著貫穿其中的角色，不論是發展、主權與責任，都需要民族主義的凝聚力才能達成。在對日外交上，鑒於這三種需求的考量，中共也將更加重視與加強中日之間共同利益。至於如何能在衝突與共同利益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這或許也就是中共不斷強調理性與健康民族主義的原因，以防止激烈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緒，掩蓋了理性的國家外交需求。



⁶⁶ 王逸舟，「面向 21 世紀的中國外交：三種需求的尋求及其平衡」，王緝思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大國戰略卷**（台北：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96-216。